

# 支持家庭福利政策之影響因素： 研究回顧與展望

王 方

## 壹、前言

國際學界對於福利方案支持之研究，一直有限（Cook & Barrett 1992 年對美國的研究是少數的例外）。究竟是那些因素影響民眾對家庭福利方案的支持？學界的了解仍頗不足，這方面的研究在開發中國家（如臺灣）更是缺乏。傅立葉（1994）曾探討民眾的福利態度，然而民眾對特定福利方案的態度，非其研究重點。呂寶靜（1995）觸及民意與社會福利，然而皆未做深入的統計檢驗，不易確定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民眾對福利方案的態度。林萬億（1995）曾研究臺灣地區民眾的福利意識型態，不過，到底是那些因素影響民眾對福利方案的支持？仍缺乏檢證。蕭新煌與張景旭（1995）探討了中產階級的福利態度。不過未探討各種民眾對福利方案的看法。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children's allowance or family allowance）主要是指給予有兒童的家庭現金給付，以幫助其養育兒童，可說是一種重要的家庭福利政策方案。Pampel 及 Adams（1992）指出兒童

津貼或家庭津貼可能有強化傳統家庭制度的功能，有助於傳統家庭的維持。國內對兒童津貼的主要的爭議包括：財源何處來？是否會導致財政排擠效應？是否應設排富條款？還是不分貧富皆予發放？應照普遍性原則或選擇性原則？應否資產調查？如何才符合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西方福利國的經驗究竟是否成功？台灣是否應走上福利國之路？最近相關津貼政策的討論再度出現，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民眾對兒童津貼方案的看法，卻少有探討。本文一方面根據國外文獻，整理出影響民眾對兒童津貼態度之影響因素，同時指出以往較受忽略的歸因值得注意。

兒童與婦女福利在許多國家的發展較慢，與以下的想法有關：兒童與婦女應待在家中，婦女應照顧好兒童，因而國家並無必要再予以現金給付。兒童與婦女常被視為相關聯的，他們被視為是家庭領域的一部分，且皆被認為不適合公領域之工作。為何照顧兒童通常被視為是婦女的職責呢？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1)兒童是由

婦女懷胎生出的；(2)一般認為，婦女比男性擅長照顧兒童，因此兒童與婦女被視為有高度的關聯性。相關家庭福利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立基於以下的假定：婦女應該在家照顧兒童或其他家人。因而相關政策往往有一項潛在的作用：建立一障礙，使婦女不易離開家庭出外工作，或使婦女缺少出去工作的動機。在此情形下，相關政策可能強化了其依賴性（Miller 1987）。兒童津貼與針對婦女之照顧者津貼的一個潛在作用，正在其幫助兒童與相關婦女並部分修正國家政策，而較不威脅到父權社會的基本假定。因為相關津貼提供，基本上不易增加婦女外出工作之誘因（Miller 1987）。兒童津貼與針對婦女之照顧者津貼因為有類似之潛在作用。

以往對台灣社會福利政策的研究常過重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低估了民意與社會力對福利政策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台灣「整個醫療保險的歷史，從來不見社會力量的參與」（林國明 1998：38）。其實農保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的突破，即應與當時的社會力量有關（註 1）。我國的國家自主性雖高，但在福利政策上並非完全不受民意與社會力的影響。國家自主性也非永久不變的，隨著政黨競爭的日趨激烈，國家自主性與其因應社會壓力的作法皆可能逐漸改變。各黨近年來試圖以年金、津貼等福利政策來爭取民眾的支持，以及 1997 年國民黨在老人年金（敬老津貼）政策上的急轉彎，都應與為了爭取更多民意的支持有關連。老農津貼的闖關成功，更與國民黨「老農派」立委

因選民壓力而不顧黨中央的意旨有關（註 2）。各類津貼成為備受各界矚目的社會福利方案。這些皆可看出，近年來台灣的福利政策雖不能說是由民意主導，然而民意對福利政策似已逐漸有一定的影響。這也說明民眾對福利政策方案的態度，已愈來愈值得研究。

## 貳、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

Pampel 及 Adams（1992）在對於 18 個先進工業民主國所做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影響兒童津貼方案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大量的老年人口、統合主義結構（corporatist structures）、天主教教義及左派執政當時的政治結構。他們指出，老年人口結構在統合主義國家中對兒童津貼支出的影響力，較其在左派執政國家中之影響力大。此外，兒童津貼方案可能有強化傳統家庭制度的功能。在統合主義式國家中，整體來說，宗教有時扮演了一個比市場更重要的角色將兒童定位。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兒童津貼有助於傳統家庭的維持。還有些北歐與西歐國家（如瑞典、荷蘭）的兒童津貼突顯出兒童的地位，顯示對兒童權利的重視。

依 Esping-Andersen（1990）的分類，自由主義式國家（如美國）強調工作倫理，並傾向採用社會救濟方案而非普遍性方案。這個事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大部分的西歐國家有兒童津貼，而美國過去只有一些針對低收入家庭的方案，例如，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與自由主義式國家相較，統

合主義式國家較注重兒童津貼。至於社會民主式國家（例如，瑞典），因為其較不可能將福利方案與市場或工作倫理聯想在一起，所以較傾向採用普遍性原則的兒童津貼。西歐的法國與比利時很早就有兒童津貼，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法國開始針對有子女的勞工家庭發放，北歐、西歐、甚至南歐國家也逐漸開始發放。

先進國家對兒童津貼的年齡限制，通常定於 15 至 19 歲，配合基礎教育、就學時間與最低的工作年齡。先進國家發放兒童津貼，一般沒有排富的規定，換言之，不論資產與所得，只要家中有未成年的兒童，一律發放。老年人與兒童為多數國家的兩個主要的家庭中依賴人口群，然而為何老人福利通常較受政治人物的重視呢？。從人口變化來看，壽命的延長與生育率的降低，皆有助於說明為何老年人口較受政治人物的重視。另一方面，老人雖然離開職場，但其在政治影響力上仍可能持續（例如透過投票）。兒童則無投票權，而且隨著破碎家庭與單親家庭的增加，兒童福利可能帶來的選票影響也有限。以台灣為例，老人年金（敬老津貼）議題自 1992 年立委選舉開始，經常成為選戰中的焦點。而兒童津貼則較少成為選戰的主要議題。

### 參、台灣的發展

行政院主計處的一項調查顯示，已婚而離職的女性中，有超過 8 成是為了照顧孩子（行政院主計處 199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對台灣女性勞工的一項調查顯示，

在台灣沒有工作的婦女中，有超過 3 成的女性，因需照顧孩子而在一年內不願出外工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5），王麗容（1992）對台北市職業婦女的調查也發現，托嬰的需求極為嚴重。

在 1993 至 1994 年的選舉中，民進黨曾以老人年金（敬老津貼）為競選之重要訴求。在 1994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民進黨亦曾提及兒童津貼的構想，而國民黨當時皆抨擊民進黨的主張。當時媒體輿論似多認為朝野兩大黨的支持者，在社會福利方案（如津貼）的態度上有顯著的不同。在 1993 年出版的民進黨政策白皮書「公平正義的福利國」（民主進步黨，1993）中，曾提出家庭津貼的主張：為了保證未成年子女得到適當的照顧、教養、健康發展，並且鼓勵適婚青年結婚生育，應給予有養育未成年或成年但無工作能力的子女家庭生活津貼。家庭津貼的給付水準應能維持子女的基本健康營養、教育所需，且不以所得調查為給付的資格審查要件，而是以有無未成年子女為發放要件。1997 年民進黨主政的台北市再度提出兒童津貼的主張，再次引發各方的熱烈爭議。而婦女因為照顧家人，而沒有出外工作，是否應該領取一些津貼？國家政策是否應對女性照顧者重新定位？近來亦引發討論（如劉梅君，1997）。

1991 年國民大會選舉，陳清卯（中華社會民主黨籍）在選戰中，提出養老金與家庭補助金的構想。其中養老金是給予 65 歲以上的老人，每月 5 千元，這似乎是選戰中最早出現的敬老津貼版本。而家

庭補助金則是給予 15 歲以下的兒童每月 1 千元，這可能是選戰中最早出現的兒童津貼版本，不過當時陳清卯並未當選（孫健忠，1997）。

1996 年 4 月 26 日，台北市議會通過了由賈毅然議員（新黨）提出的兒童津貼提案，要求市政府針對市內中低收入家庭的學齡前兒童，發放每人每月 3 千元的津貼。此提案並經三黨議員之連署，提案中設有排富條款。台北市議會通過的版本對發放對象有幾項限制：除了需設籍台北市滿兩年與子女未進公立托兒所，每戶每人所得亦必須低於一定標準。

1997 年 8 月 12 日上午，台北市長陳水扁於市政會議中表示，爲了進一步提升台北市的兒童福利品質，並有效減輕家庭養育子女之負擔，台北市政府擬實施兒童津貼政策。陳水扁市長並未詳細說明細節，市政會議結束之後，社會局局長陳菊表示，依據初步的規劃，每位兒童每月將發放 3 千至 5 千元。就讀於公立幼稚園或托兒所的兒童，因其已得到政府的補助，故不在兒童津貼發放之列。另外兒童津貼沒有排富條款，不以資產調查爲發放依據，這是與 1996 年市議會通過的版本最主要的不同處。台北市政府對兒童津貼的構想曝光後，引起各界廣泛的迴響。不少市議員持反對的態度，媒體與民眾亦質疑其沒有排富條款，不分貧富一律發放的做法。後來台北市政府調整了原先的做法（中國時報 1997 年 8 月 13 日）。

新竹縣市、台南縣市、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等則都發放婦女生育補助津

貼。與台北市政府原擬發放的兒童津貼並不相同，以新竹市來說，生育補助津貼逐加碼，生育第 1 胎今年補助新台幣 1 萬 5 千元、第 2 胎則補助 2 萬元、第 3 胎以上補助 2 萬 5 千元。新竹市更全台首創生雙胞胎補助 5 萬元、三胞胎補助 10 萬元。

在千呼萬喚之下，「兩性工作平等法」終於在 2002 年施行，該法曾明文規定「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然而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數年來，育嬰津貼相關立法卻少有動靜。不久前據媒體報導（[www.sina.com.tw](http://www.sina.com.tw) 新浪網新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應元表示，台灣女性勞動力偏低，主因在女性薪資與較低，此外受傳統觀念影響，家庭照顧、兒童照顧的負擔往往落在女性身上，加上婚後生育復出職業比率較低，使女性勞動參與率偏低。根據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定，婦女可請育嬰假，最高期限爲 2 年，然而育嬰假期間是留職停薪，婦女並沒有收入，所以，李應元表示考慮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穩定婦女就業，此項方案，預計今年底前提出就業保險法修正案，從就業保險基金支應這筆財源。勞委會綜合規劃處長李來希則進一步表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目前初步規劃按勞保投保薪資給付 3 至 5 成，如最高給付 5 成，婦女每月可領到補助津貼 13,500 元，發放期限勞委會建議最高以不超過 6 個月爲限。這雖與以往台北市政府擬推動的兒童津貼不同，但相關言論又再度引起熱烈的討論。

最近相關津貼政策的討論再度出現，

然而究竟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民眾對相關津貼方案的看法，卻少有探討。

#### 肆、影響民眾相關政策態度的因素

下面以兒童津貼為例，整理出可能影響民眾支持相關家庭福利政策態度的因素：

首先是自利或弱勢因素，根據此論點，自利或弱勢因素對是否支持相關兒童津貼政策有重要的影響（Baldwin 1990, 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 Kluegel and Smith 1986）。國外的研究發現：少數民族、低收入、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較可能認同照顧弱勢的福利政策，而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較不可能認同（Feldman 1983, Huber and Form 1973, Kluegel and Smith 1983, Robinson and Bell 1978）。Huber and Form（1973）也發現高收入的白人，比低收入的白人與黑人，較不認同照顧弱勢的福利政策。林萬億（1995）指出，依弱勢原則，婚姻解組者應比較支持社會保障政策，其發現婚姻狀況在傳統慈善福利態度上確實有顯著差異。除了少數的例外（如 Form and Hanson 1985），多數研究都發現，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較可能認同照顧弱勢的福利政策。如前述，即使不用自利這個觀念，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民眾的社會態度應會與其生活經驗相符（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因此家中幼年人口較多的人、經濟上較弱勢的人、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可能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也較贊成兒童津貼政策。家中幼年人口較少的人、在經濟上居於較優勢的

人，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也較不贊成政府兒童津貼政策。

過去的研究發現社會階層地位與歸因又可能影響民眾對政府提供保障政策的態度，關秉寅、黃毅志（1997）指出，成就歸因對減少貧富差距之態度有顯著影響。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收入較低者比較可能將成功做外在歸因。相對的，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收入較高者比較可能將成功做內在歸因。在成就歸因方面越傾向外在結構歸因的人，越主張保障弱勢者。此外，台灣民眾在成就歸因方面有相當的共識，多數民眾在成就歸因上傾向內在歸因，居住地則影響不顯著。瞿海源與蔡淑玲（1988）也發現，台灣的大學生傾向將窮困做內在歸因。Kluegel（1990）顯示，一個人的困境歸因可能影響其對相關保障弱勢政策之態度。許多研究都發現，傾向對困境或貧窮做內在/個人歸因的人，對保障弱勢較持保留或負面的態度（Bullock, Williams, and Limbert 2001, 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 Iyengar 1990, Smith and Stone 1989）。

其次是教育因素，教育的影響相當特別，一方面，教育程度較高，社會地位可能也較高，因而較不贊成照顧弱勢的福利政策。然而，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由於社會化的過程，現代教育使人逐漸學到社會公平等價值觀（Kluegel and Smith 1986, Nasser, Singhal and Abouchdid 2005），故教育與職業、收入等變項不盡完全相同，未必能混為一談。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可

能接受社會公平的價值觀，因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也較可能贊成兒童津貼政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較不贊成兒童津貼政策（Hyman and Wright 1979, McClosky and Brill 1983, Robinson and Bell 1978, Sullivan et al. 1982）。不過，Robinson and Bell（1978）的研究顯示，教育與公平價值觀究竟是何關係，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有異。Jackman and Muha（1984）則發現不同情境下，教育程度對政策態度的影響可能不同。教育對民眾兒童津貼政策態度之影響為何？值得以後探討。

再其次是政黨屬性因素，過去的研究發現政黨認同對一個人的政策態度有影響。Cook and Barrett（1992）對美國的研究指出，民主黨的支持者比共和黨的支持者較認同政府提供保障。Ladd（1985）亦有類似的發現。林萬億（1995）對臺灣的研究發現，民進黨的支持者在制度性福利意識型態上，強於新黨支持者，而新黨支持者的制度性福利意識型態又強於國民黨的支持者。王方（2001）發現：與國民黨的支持者相比，民進黨支持者的社會公平意識型態較強，與國民黨的支持者相比，民進黨的支持者與無明顯政黨支持的民眾，其經濟個人主義較弱。新黨支持者的福利意識型態，則不易與國民黨的支持者顯著區分，這或許由於新黨領導精英原多出自國民黨，而新黨在社會議題上又較少提出特殊主張之故。由此來看，民進黨支持者對社會公平的滿意程度可能與國民黨

的支持者不同，民進黨支持者對政府提供保障的態度也可能與國民黨的支持者不同。近年來政黨出現新的變化，親民黨與台聯黨支持者對兒童津貼政策，是何態度？各政黨支持者的態度有何異同？值得未來研究。

還有年齡因素，有研究發現年齡可能影響民眾對照顧弱勢社會政策之態度，根據此一觀點，整個歷史的潮流是逐漸趨向社會公平的（Beteille 1969），因而年輕人較可能強調社會公平，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較可能贊成照顧弱勢的福利政策。年齡較大者，則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也較不贊成照顧弱勢的福利政策。當然我們應知道，年齡對態度的效應不易與世代（cohort）的效應區分（Mayer 1992），這是社會科學界普遍面臨的問題。而且，老年人也可能因為自利的因素而支持相關照顧老人的福利政策。因此，不同年齡的民眾對兒童津貼政策的態度究竟有何異同，值得未來特別加以探討。

最後是效率因素，如 Katz（1986）所言，政策的施行，往往伴隨著效率的辯論。按照此一論點，認為政府有效率的人，較可能支持兒童津貼政策。

## 伍、結論與討論

國際學界對於家庭福利政策等社福政策支持之研究一直有限。究竟是那些因素影響民眾對兒童津貼的支持？值得研究。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可說是一種重要的家庭福利政策方案。本文對支持兒童津貼的可能影響因素做了整理探討。

另一方面，「福利國」(the welfare state) 在許多國家都曾引起廣泛爭議 (Marsland 1996, Kwak 1994, Johnson 1987, Mishra 1984)。國內近年來，各界也曾針對「福利國」展開廣泛而激烈的辯論。1992 年行政院長郝柏村與一些民進黨立委對「福利國」的爭辯，即曾引起社會各界相當大的迴響。然而朝野在辯論「福利國」之時，似乎認定一般人對於「福利國」不是贊成，就是反對。其實，所謂的「福利國」乃是由許多福利方案所組成的。一個人是否可能只贊成「福利國」各方案中的某些部分而反對其他部分（或是對某些部分沒什麼意見）？支持兒童津貼的人是否也會支持其他福利津貼？支持兒童津貼的人是否也會支持其他的家庭福利政策？這些問題在學術上與政策上都有重要的意義。對此問題的實證研究，將有助於了解究竟「福利國」的各種方案，那些比較受民眾的支持，以及各種方案的支持者與反對者有何特徵，研究成果不但有助於了解國內民意，並可對社會政策的擬定與執行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對於何種社會福利方案比較受民眾的支持，學界的看法不一。Katz (1986) 指出，民眾較不支持以徵稅為財源的福利方案。Hewlett (1991) 則認為，民眾較傾向支持老人福利方案，而非其他福利。Pampel 與 Adams (1992) 指出，支持兒童福利方案的人，也傾向支持其他（如老人）福利方案。Skocpol (1990) 認為，人們對社會保險方案的支持大於對救濟方案的支持。這些學者的看法也顯示，民眾

對不同福利方案的態度是可以比較的。

以往對福利政策支持之研究較忽略民眾的歸因，根據值得性 (deservingness) 的觀點，民眾認為何種人較值得幫助，而何種人較不值得幫助，將影響其對相關社會政策的態度 (Axinn and Levin 1975, Leiby 1978, Macro 1978)。然而，值得性並不易測量，國內有關值得性的研究更是不足，民眾的歸因是否與其判斷何種人較值得幫助有關，是未來相當有趣的研究問題。例如：如果認為一家的未成年子女較多，是因為其自己不控制生育，如此恐較反對發放兒童津貼。

歸因可說是人們對經歷事件的主觀解釋，也可說是個體推論事件原因與性質的過程，包括對自己與他人行為原因的知覺或判斷。對事件推論原因的心理歷程，可能影響個人未來的行為 (Russell 1982)。一般有關歸因之研究，通常可分為兩種觀點：(1) 個體歸因 (individualistic attributes)：強調個體智能、努力與動機等內在因素。(2) 結構歸因 (structural attributes)：強調機會結構等外在因素 (Kluegel 1990, Sigelman and Welch 1991)。傾向對困境做外在歸因的人，乃是將困境歸因於機會結構等外在因素，而非個人努力等內在因素，如此較可能贊成政府提供保障。傾向對困境做內在歸因的人，乃是將困境歸因於個人努力等內在因素，如此較不可能贊成政府提供保障。Heider (1958) 的歸因理論亦同樣指出在解釋遭遇或行為時有兩種途徑：(1) 內在歸因：指受到可受個人控制因素之影響，(2)

外在歸因：指受到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內在歸因基本上是指將遭遇歸於內在的因素（例如個人條件、本身的努力、能力等），至於外在歸因則是指將遭遇歸於外在的因素（例如外在環境、運氣等）。

許多研究（如 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發現確實有內在／個體歸因與外在／結構歸因，所謂的內在／個體歸因是指視個人特質或個人可掌握的事物為困境原因；而外在／結構歸因則是指個人無法掌握的事物為困境的原因。但 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 發現美國人可能還有文化因素。另有部分研究（如 Bullock 1999, Bullock et al. 2001, Feagin 1972）指出可能有命定的因素。Kluegel and Smith (1981, 1986) 運用性別、年齡、收入、階級位置等因素來解釋一個人的歸因；Hunt (1996) 與 Singh (1989) 以族群來解釋一個人對困境的歸因；Furnham (1982) 與 Singh (1989) 以政治因素來解釋一個人的歸因。Singh (1989) 指出政黨屬性、性別、族群、發展階段等因素都會影響一個人對困境的歸因。Williamson (1974) 則強調經濟狀況對困境歸因之影響。Nilson (1981) 以教育、收入、職業身分來解釋一個人對困境的歸因。關秉寅、黃毅志 (1997) 發現居住地則對台灣民眾之歸因與保障態度之影響不顯著。

如傅仰止 (1994) 所言，歸因於個人或結構因素，在解釋方向上未必是互斥的。即使有某些人同時贊成或不贊成 2 種歸因解釋，基本上仍可區辨對保障

弱勢者的政策是趨向支持或保留。究竟影響台灣民眾歸因之因素為何？歸因對是否支持兒童津貼等家庭福利政策有顯著影響？一直缺乏深入研究，值得以後探討。

隨著近年快速的民主化，相關保障政策更需要考慮民眾的支持。隨著近年政黨競爭與選戰逐趨激烈，政策的擬定已越來越不能忽視民意，規劃再好的家庭福利政策，如果沒有得到民眾足夠的支持，恐怕政策難以推動成功。今後應加強研究民眾對家庭福利政策之態度。

最後，新興的勞動方式，例如「電傳勞動」(telework) 可能帶來新的家庭問題，也對家庭福利政策帶來挑戰。電傳勞動可能對需要照顧兒童的女性有利，女性可因而兼顧工作與子女照顧。傳統對政府應提供何種保障的思考通常是基於以下的假設：固定的工作時間地點與雇主、全職工作、男性居勞動者主體、家庭與工作場所清楚的界限。但電傳勞動帶來重大的變化，不再受限於固定工作時間地點與雇主，家庭與工作場所的界限也可能打破，女性電傳勞動者的比例也可能增加，這使得傳統的家庭福利政策與相關社會安全的思考，已不能充分的適用於所有電傳勞動者與其家庭了。兒童津貼是否應全面發放給有幼兒的家庭？針對電傳勞動的女性，應提供何種家庭福利政策，都值得研究。另須注意的是，女性也可能因缺乏訓練與相關器材，而不易成為電傳勞動者，即使女性成為電傳勞動者，也可能會因



為訓練不足或市場結構不公，而始終不易取得傳統的受雇勞工身分，使其相關的福利保障更為缺乏（王方 2002）。電傳勞動可能衝擊傳統的家庭與工作場所的界限，也對傳統的家庭福利政策帶來新的挑

戰，未來相關兒童津貼等家庭福利政策的規劃，應將新工作方式的影響，納入考量。

（本文作者現為文化大學勞動研究所副教授）

## 註釋

註 1：農保的突破主要在 1970 年代以後，不過，當時國家自主性尚強，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運作尚稱有效（Wang 1994），農保在整個 1970 年代以前可說主要在政治宣示的作用。1973 年衛生署成立了農民健康保險專案研究小組，就農保問題與相關單位進行研討，這或許與蔣經國先生展開接班，爭取農業部門民心有關，也與當年國內外情勢有關（例如提升蔣經國先生擔任接班人之民間聲望）。1980 年代以後後情況漸改變，先是省議會將省政府所提之農保草案大幅修改，這也應與爭取農民支持有關。接著行政院遲遲未核定省議會通過之辦法，以致省政府竟擬以勞保為前例，而立訂行政命令以求先行試辦。另一方面，以高雄縣黨外余家班為首的五個縣市政府，準備自行負擔經費，提前全面辦理農保。1988 年 5 月 20 日數千農民更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行政院及立法院抗議，提出包括全面辦理農保及農眷保等訴求，最後引發「520」事件。一連串的事件對政府的農保政策似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同年的 7 月 14 日，省政府主席宣布，自光復節起全面試辦農民健康保險（王正勤 1994）。當局甚至在未完成立法前，即以行政命令方式全面試辦農保（曾士恒 1998，陳琇惠 1996）。從農保獲得全面試辦的過程來說，恐怕很難說是國家自主性的充分展現，國家自主性似非絕對不變的，也可看出社會力對社會政策漸有一定的影響（王方 2001）。

註 2：相關經過可參見李明璁（1996）、孫健忠（1997）、王方（2001）。

註 3：所謂的電傳勞動是指「運用電子通訊技術與雇主或同仁聯繫，藉以溝通與傳輸工作成果之勞動方式，而其工作位置通常在雇主之主要營業場所之外或與委託人所在地點分離。」（王方 2002：159）。由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出現，使得集中式的傳統工作方式受到反省，E 化（電子化）與 M 化（行動化）的電傳勞動，可做為部分企業的因應方式，這使得電傳勞動的可能性更值得重視）。

## 📖 參考文獻

- 王方（2001）台灣民眾社會福利態度之決定因素初探，東吳社會學報，11，137～162。
- 王方（2002）「電傳勞動」對福利的影響：新工作型態對勞工福利帶來的省思，台灣社會福利學刊，2，155～181。
- 王正勤（1994）台灣威權體制下的福利政策。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麗容（1992）台北市婦女就業與兒童福利需求之研究，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 民主進步黨（1993）公平正義的福利國——民主進步黨的社會福利政策（政策白皮書），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 行政院主計處（1994）中華民國 82 年台灣地區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5）1994 年台灣地區婦女勞工統計。
- 呂寶靜（1995）民意與社會福利，見中華民國現代社會福利協會編輯，台灣的社會福利：民間觀點，67～102，五南出版社。
- 李明璁（1996）國家機器、政治轉型與社會福利——以老人年金議題之發展為例（1992～1995）清華大學社會暨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國明（1998）制度選擇的政治與歷史邏輯：解釋台灣全民健保組織體制的制度形成，台灣社會福利發展—過去、現在、未來學術研討會。
- 林萬億（1995）影響台灣民眾社會福利態度的因素，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 83 年 2 月定期調查報告，17～41，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孫健忠（1997）社會津貼實施經驗的反省：以敬老津貼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73～98。
- 陳琇惠（1995）農民健康保險的回顧，收錄於蔡漢賢編，社會福利行政工作經驗傳承，台北，中國社會行政學會。
- 曾士恆（1998）臺灣社會保險政策之政經分析，成大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傅立葉（1994）從老年所得保障看台灣社會福利體系的階層化，國科會委託研究報告。
- 傅仰止（1994）台灣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與原住民觀點，中央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35～87。
- 關秉寅與黃毅志（1997）台灣社會民眾對成就歸因與重分配政策之態度，90 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147～187。
- 瞿海源、蔡淑玲（1988）台灣大學生對社會公平的看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6）：105～131。
- 蕭新煌、張景旭（1995）台灣社會福利的社會基礎：階級與福利理念的類型分析，社區發展季刊，70，6～32。
- Axinn, J. and H. Levin (1975) Social Welfare: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Need.

- New York: Harper & Row.
- Baldwin, P. (1990)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teille, A. (1969) "The Declin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Andre Beille ed. *Social Inequality: Selected Readings*. Baltimore Penguin.
- Bullock, H. E., Williams, W. R., & Limbert, W. M. (2001) *Attributions,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Support for Progressive Welfare Policies*.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 Cook, Fay Lomax and Edith J. Barrett (1992) *Support for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the Views of Congress and the Publ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zzarelli, C., Wilkinson, A.V., & Tagler, M. J. (2001)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and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2), 207-227.
-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ldman, Stanley (1983)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1:3-29.
- Form W.and C. Hanson (1985) "The Consistency of Ideologies of Economic Justice."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239-269.
- Hasenfeld, Yeheskel and Jane A. Rafferty (1989)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Forces*, 67, 1027-48.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and Son.
- Hewlett, Sylvia Ann. (1991) *When the Bough Break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uber,J. and W.Form (1973) *Income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Formula*, Free Press.
- Hyman, H.H. and C.R.Wright (1979) *Education's Lasting Influence on Valu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yengar, S. (1990) "Framing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Issues: The Case of Poverty". *Political Behavior*, 12(1), 19-40.
- Jackman, M. amd M. Muha (1984) "Education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751-769.
- Katz, M.B. (1992) "The New Politic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n", *Dissent* 39, 4(169):548-553.
- Kluegel, J.R. (1990) "Trends in Whites' Explanations of the Black-White Gap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1977-1989." *Amercia Sociological Review* 55(4); 512-525.

- K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merican 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NY: Aldine de Gruyter.
- Kwak, Hyo Moon (1994) *Welfare Policy and Welfare State*. Seoul, Korea: Chomyung Press.
- Ladd, E.C. (1985) *The American Polity: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New York: W.W. Norton.
- Leiby, James (1978)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carov, David (1978) *The Design of Social Welfare*. NY: Holt.
- Marsland, David (1996) *Welfare of Welfare State?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in Social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ayer, William (1992)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McClosky, H. and A. Brill (1983) *Dimensions of Tolerance*. Russell Sage.
- Miller, Dorothy C. (1987) "Children's Policy and Women's Policy: Congruence or Conflict?" *Social Work*, July-August 1987.
- Nasser, R. and K. Abouchedid (2005) "Causal Attribution of Poverty among Leb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11(1): 205-219.
- Pampel, Fred C. and Williamson, John B. (1989) *Age, Class, Polit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R.V., and W. Bell (1978) "Equality, Success, and Social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25-43.
- Russell, D.W. and E. McAulley (1987) "Measuring Causal Attributions for Success and Failure: A Comparison of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Causal Dimen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48-1257.
- Sigelman, L. and S. Welch (1991) *Black Americans' Views of Racial Inequality: The Dream Deferr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2) *Protecting Mothers and Soldier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K. B., & Stone, L. H. (1989) "Rags, Riches, and Bootstraps: Beliefs About the Causes of Wealth and Pover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0 (1), 93-107.
- Wang, Fang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Clientelism in Taiwan*, in Luis Roniger and Ayse Gunes-Ayata (eds), *Democracy, Clientelism and Civil Society*, 181- 205.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